



文艺评论是推动美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

□屈健



宝塔葵花 石鲁作

文艺评论是推动文艺创作的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受众认知,辨善恶、鉴美丑,而且在助力新时代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新的时代风貌和审美需求,《美术》杂志以“长安画派”的创作为契机,通过长期的持续关注、作品推介和理论研讨,展开了对中国画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创新发展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作为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对党领导下艺术创作的道路选择、艺术评论的方式标准、艺术理论的建构发展等关乎新中国美术变革转型的重要内容做了实质性的探讨和强有力的推进。

“长安画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端于西北地区的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绘画流派,在中国艺术版图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美术》杂志对“长安画派”长达6年的持续关注和推介中,王朝闻、蔡若虹、施立华、阎雨川、周韶华等活跃于新中国美术理论、评论舞台上的学者、评论家纷纷发文,通过对“长安画派”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表现题材、笔墨语言、改革创新等内容的理论研讨,奏响了关于“长安画派”及新中国画相关问题的宏大合唱,形成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从这个角度看,“长安画派”的创作与美术界的评论不但超越了地域性画派的拘囿,而且以一种更为广博的视角和思想深度,具有了国家层面的理论价值和探索高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改造旧国画为切入点,美术界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方向。反映劳动人民在伟大革命实践中的功绩、感情、愿望及精神面貌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美术创作的主题。身居长安的石鲁、赵望云等画家通过一系列方法探索,如集体写生、讨论观摩等,创作出了一大批时代感鲜明的作品,如《古长城外》《转战陕北》《改造荒山 学习文化》《驯服黄河》等。这些作品以人民生活为素材,采用新的表现手法和笔墨语言,逐渐成为评论界聚焦的重要对象。1959年-1964年,《美术》杂志本着“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目标,刊登了与“长安画派”相关的评论文章25篇、美术作品16幅,将“长安画派”置身于中国画革新运动的时代洪流中进行讨论,既树立了美术创作的成功典范,又提升了问题探讨的理论高度,产生了一种创作实践和艺术评论双向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效应。

依据发文数量与社会关注度,《美术》对“长安画派”的推介大致可分为前期蓄势阶段(1959年-1960年)、集中讨论阶段(1961年-1963年)和后续关注阶段(1964年)。这三个阶段在时序上呈连续之势,紧密相扣,跌宕起伏。尤其是1962年由孟兰亭《来函函登》引发的激烈讨论,更是将美术界的关注点聚焦在了“长安画派”的艺术探讨上,使“长安画派”以群体的形象集体亮相,以空前未有的画风成为业界的重点讨论对象。可以说,这一阶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的重要指示精神,6月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市文物局开展战略合作暨共建“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签约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在现场领导和嘉宾的见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喻剑南和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凌明签署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市文物局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协调彼此资源,进行多方位合作,共同推进大运河保护利用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兼局长陈名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等多位领导和艺研院各部门负责人出席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双方就下一步合作事项进行了座谈。韩子勇在致辞中表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大命题、大手笔。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促进双赢。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市文物局将强强合作、和衷共济、有声有色,产生1+1>2的效果,使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迈向新台阶。陈名杰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城的历史与运河渊源深厚,通过双方合作将共同擦亮大运河这张国家级名片。北京在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方面要走在全国前列,要在



延安火炬 蔡亮作

段针对美术创作中出现的题材、风格、形式等问题,《美术》杂志以“长安画派”的艺术探索为突破,在中国画传统与革新的论争中树立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时代典型。

借助《美术》杂志这一重要媒介平台,对“长安画派”的讨论形成了以李恂、周韶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派和以阎雨川、施立华等为代表的批评派两大阵营。其中,李恂在《与孟兰亭先生商榷》中,谈及石鲁“并没有忽视对笔墨的追求,并且已经开始显露了朴厚雄健而又稚拙天然的风格”。周韶华在《问〈喝‘倒彩’〉者》一文中认为石鲁的作品“表达了我们人民的革命感情,体现了革命的思想主题;同时在艺术构思和艺术技巧上,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上,有新的探索”,尽管施立华等人指出了石鲁作品的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反之,施立华在《喝“倒彩”》一文中,提出艺术评论应以谢赫“六法”为准则,认为“无论石的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如何之深,思想内容如何之高,以中国画的眼光来看还差了一段距离”。“喝彩固然是,但有喝彩不恰当的也应该喝喝彩者的‘倒彩’”。阎雨川则在《论“野怪乱黑”》中,评论石鲁的作品“野是艺术技巧的不成熟;怪是艺术规律和生活规律的反常;乱是结构用笔的不严谨,不精练,缺乏节奏感;黑是用墨用色无变化,少气韵,没有虚实关系”,“‘野怪乱黑’虽可能为少数人所欣赏,但未必是优良的传统,同时也绝不是革新创造之正途”。伴随着评论家们立足文化思想史和艺术方法论进行艺术评论,“长安画派”艺术探索的价值逐步明晰。直到1963年,王朝闻发表《探索再探索》一文,认为“就怎样继承祖国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一点而论,石鲁一而再再而三的探索和尝试,具有明确和正确的目的,因而不论这一过程中的成熟度如何,他的道路是应当肯定的”。王朝闻对石鲁的艺术探索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才使得这场论争渐进尾声。

由此可见,《美术》杂志对“长安画派”的讨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而营造了主流思想引领、具体案例分析、自由探讨批评的学术氛围。美术界对“长安画派”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艺术评论的方式推进中国画推陈出新的路径选择和评价标准的重新确立。艺术评论的多样性客观上推动了“长安画派”的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激励着石鲁等艺术家对生活和传统、人民性和民族性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如何跳出古人的藩篱,构建符合时代主流思想、满足大众需求、反映艺术规律、蕴含传统文化、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诸如此类的美术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的呼应和互动中,逐渐清晰和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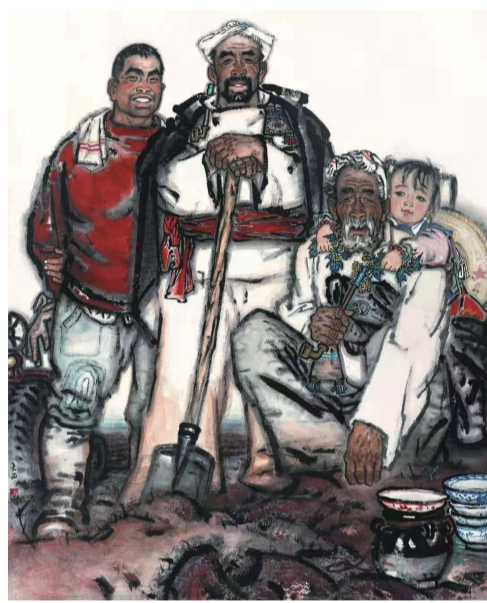
回望建党百年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不难发现,优秀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总是不断地通过文艺评论的价值引领得以实现的。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党在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人民性导向上,从陈独秀早期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鲁迅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中国“二为”“双百”方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引领。建党百年来,客观公正的文艺评论不断修正着文艺创作的发展路线,使得体现现实生活厚度,时代精神锐度和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市文物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

五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文脉的梳理与价值阐释;二是文物本体的保护、展示与利用;三是文艺创作;四是文化节庆、文化利用;五是文化创意产业。双方将以签约作为起点,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贡献力量。

国家文化公园汇聚了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承载了民族记忆,是国家的象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精神而实施的重大综合性工程。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计划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设于艺研院,今年2月举行了挂牌仪式,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工作机制构建开启新的阶段。委员会81位专家学者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决策咨询,评议各地报审的材料。艺研院组织十余位学者撰写



祖孙三代 刘文西作

族风格、中国气派高度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

其中,生活的厚度即对生活的表现、对生活的赞美、对生活的记录和批判意识。最近新上映的电影《柳青》讲述了文学家柳青的艺术人生,其中一个镜头是有人向柳青提问,文学创作成功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柳青说是生活。这句话道出了真谛,石鲁创作的《宝塔葵花》《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小米加步枪》《种瓜得瓜》等佳作,是基于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生活经验的长期积累;罗中创作的《父亲》,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人们对父亲形象的记忆,不仅是对生活真实的再现,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这些作品很好地表现了生活的厚度,引起了受众的情感共鸣。

时代精神,即艺术创作要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必然涉及艺术、政治、文化的关系。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傅抱石也说过“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每个时代都有烙印时代印记的艺术风格。方增先创作《粒粒皆辛苦》是基于珍惜粮食的时代要求;蔡亮的《延安火炬》表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延安群众拥上街头欢呼庆祝的时代特征;赵振华的《抗击非典》展现了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战胜灾难的时代精神。这些优秀作品均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表现时代、描绘时代、反映时代。

此外,艺术创作还要体现出对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国家能立于世界之林的底气。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东渡》、赵望云的《雪天驮运》、刘文西的《祖孙三代》、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沈尧伊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作品,在选题、艺术表现手法、风格特点等方面,都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上的精神追求,极具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两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好的文艺评论不仅对欣赏者有导向、引领作用,而且对文艺创作亦有镜鉴、聚焦的助推作用,可以培养高尚情操,彰显时代精神,提升审美品位,促进文艺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

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深入挖掘和梳理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的文化精神内涵。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公共艺术研究所申报立项了“长城、大运河和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体制机制研究”院级科研项目;出版了《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一书,《大运河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即将付梓;参编全国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完成10余项大运河省市域和点段保护规划。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依托艺研院建筑与公共艺术研究所,吸纳院属各单位相关研究和创作人员。下一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市文物局将组织开展大运河文化带重点课题调研,策划举办“大运河文化论坛”、大运河文化系列讲座等活动,编纂出版相关书籍资料,促进大运河文化宣传,全面推动北京大运河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深入发展,实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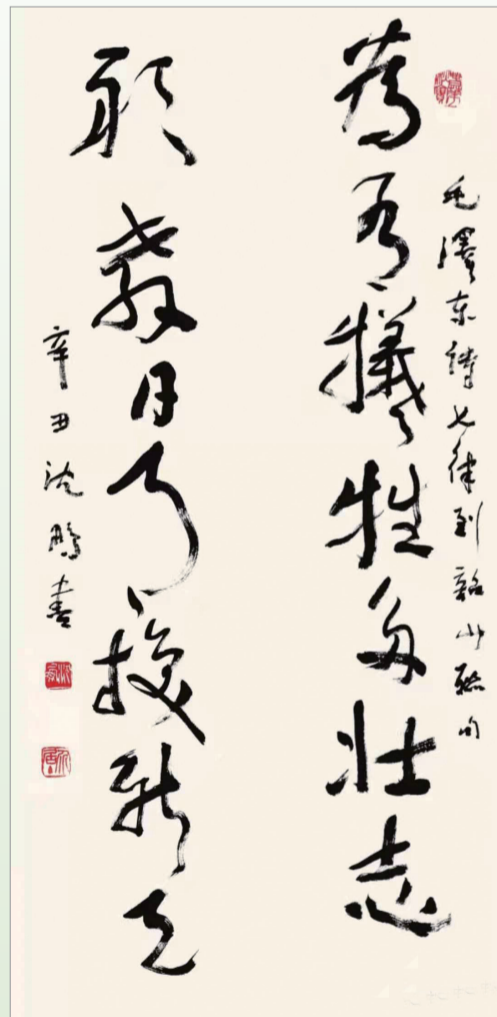
6月19日,“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书法大展围绕时代重大主题,通过书法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展览叙事手法,纪实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奋斗历程。充分发挥新时代书法记录史的功能,运用宏观全景叙事、微观人文表达的策展手法,采用沉浸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的策展理念,构建以主题思想表达为中心的集体创作模式。广大书家以党史感悟初心,以笔墨渲染时代,于守正中出新,以饱蘸浓墨书写精彩壮美的时代华章。展览分四个篇章。第一篇:百年辉煌。以长时段为线,以大事件为点,围绕百年党史153个重大事件和伟大工程,主题叙事,纪事本末,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辉煌成就;第二篇章:崇高信仰。书法创作者到所在省自治区的县市党史办、纪念馆、档案馆、烈士家乡等地深入采访、挖掘革命先烈的故事,自撰文章,我书我心,以微观的视角再现一幕幕撼人心魄的生动画面,真实有力地记录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悲壮史诗;第三篇章:光照九域。展示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以及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的早期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文艺巨匠等名家的手迹墨稿,当代书家以笔墨再现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沐浴革命理想的光辉。第四篇章:地方系列展。中国书法家协会按照全国书协一盘棋的工作理念,采取“聚焦北京,全国联动”的组织模式,通力合作,一题多展,覆盖全国。

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在致辞中谈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系列重要论述,书写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和重大成就,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从当前实际出发,引导书家学史明志、撰文记史、濡墨抒情。书法艺术不仅仅是书斋里的陶然自乐,也要因时而书、因事而为、因人而作。在中国人民追逐梦想的伟大实践中激发灵感,在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活中获得素材,在对人民真挚持久、发自内心的热爱中坚定自信,努力创作出有生活、有情感、有风骨、有魅力的书法作品。功用与艺术齐驱,文章与翰墨相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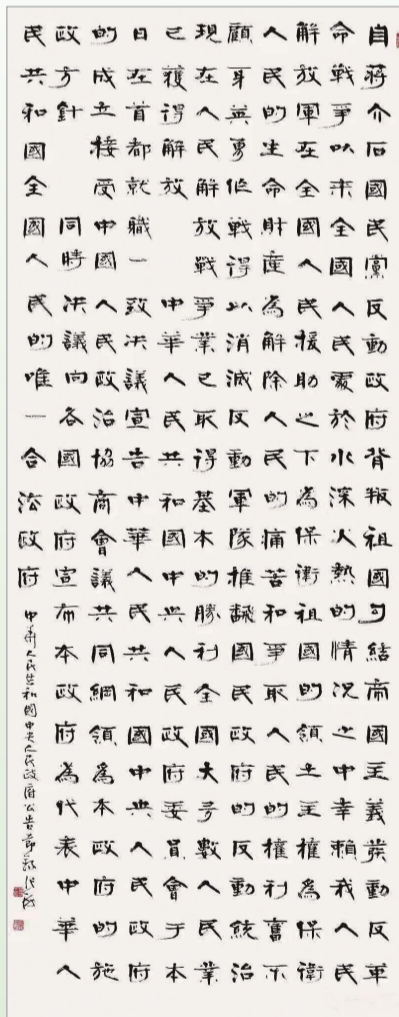
本次大展聚合了全国书坛大家名家、骨干书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中国书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文艺工作者、全国高校书法专业工作者、文博系统工作者、新闻媒体出版工作者等共同参与,479件主题展品背后凝结着当代书坛书力与信念的戮力同心,不仅为本次主题展建立学术机制、学术规范、学术标准提供了保障,也推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层创新。

“伟业展”三大篇章之“百年辉煌”“崇高信仰”在国博、国图两个场馆七个展厅同时开幕,“光照九域”将于7月初向公众开放,中国书协与各团体会员联合主办的同主题大展也以联动之势相继开展。(许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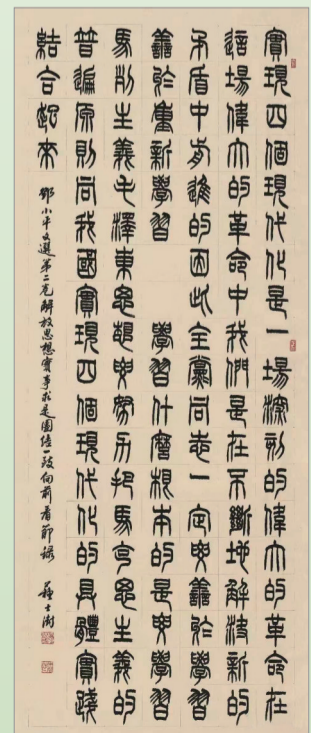
部分参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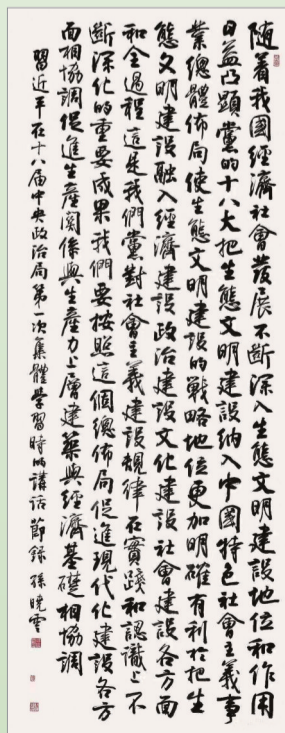
沈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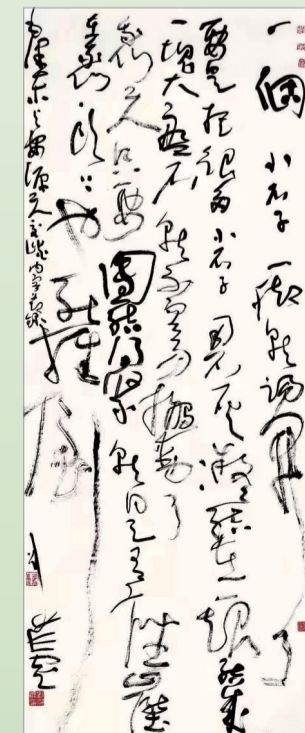
张海书



苏士澍书



孙晓云书



刘洪彪书

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在京开幕

以党史感悟初心 以笔墨渲染时代

(小字)